

麥田人文93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

重層現代性 鏡像

CULTURAL VIS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TERATI UNDER JAPANESE RULE

MIRROR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黃美娥◎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
域與文學想像 = Mirror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Cultural Vis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terati under Japanese Rule
/ 黃美娥著.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4 [民93]
面；公分. -- (麥田人文；93)
參考書目：面
ISBN 986-7413-69-5 (平裝)

1. 臺灣文學 - 歷史

850.329

93023191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麥田人文 93

重層現代性鏡像：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Mirror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Cultural Vis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terati under Japanese Rule

作者 黃美娥
主編者 國立編譯館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
主編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責任編輯 胡金倫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02)2351-6320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E-mail：hkcity@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4 年 12 月
初版三刷 2009 年 3 月

售價／420 元

ISBN：978-986-7413-69-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重層 現代性 鏡像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
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CULTURAL VIS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TERATI UNDER JAPANESE RULE

MIRROR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黃美娥●著

目次

序論

7

第一章

迎向現代

——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一八九五—一九二四）

31

第二章

對立與協力

——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一九二四—一九四二）

81

第三章

實踐與轉化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

143

第四章

另類現代性

——《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

183

第五章

舊文學新女人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

237

第六章

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

——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

285

附錄

帝國魅影

——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

343

徵引書目

381

論文出處及說明

395

序論

一、

日治時代的臺灣，處於「時間」意識與「空間」意識的重大變革階段，由於現代／殖民／本土問題的糾葛牽掣，使得人們在面對自我，以及外在社會、國家、世界時，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方式與情感結構。

隨著「二十世紀」此一話語的流行、普及，臺人對於新紀元的來到，不再把它納入舊時代循環時間的視野中，而更有了一種新的時間觀念與態度，「新」及「現代」逐漸成為時人把握世界、認識世界的思維向度。而在空間認知上，歐美等國繼中國、日本之後，也成了可供凝望、接觸、想像的西方文化版圖，因而發現了一種新的時代地理知識系統。其次，現代性（modernity）的發展和輸入，也讓臺人的身體達到相當程度的快樂、自由和進步；但同時日本帝國殖民的高壓統治、西洋文明的強勢挑戰，卻也促使其在回顧本土時，心靈倍感痛苦、威脅與矛盾。以上這些變化，乃肇因於「文明」（civilization）的結果。

「文明」是什麼？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八月，彰化古典文社「崇文社」以〈文明說〉為題對外徵文，各式有關「文明」的論述眾聲喧嘩，臺南許澄坤將文明區分為物質上的文明，包括理化的大觀、生物之特徵、地水火風的應用、農礦工商的發展，以及宗教改良、教育普及、國家道德保存、世界人道實踐的精神文明；出身澎湖的陳錫如則進一步闡述文明國家是得力於「文明政治」、「文明教化」、「文明人民」、「文明風俗」，而藏書有樓、博物有院、新報載世界時事、宣講演善惡之勸懲，四者便是文明的利器；寓居東石港的陳舉儒則直言「文明之說，所包甚廣，事實繁多，似難一一殫而述」，他列出主要四項，包括政治之文明、法律之文明、戰爭之文明、盟會之文明，其餘則尚有器物制度之文明、人事往來交際之文明等。顯然，從上述諸人的言說可以明瞭，「文明」的內涵實在包羅萬象，它涉及政治、法律、道德、經濟、教育、人際、國家、文化……等，而「文明」的無處不在，更說明了其已從抽象概念，轉而內化於時人的實際生活中，成為人群、社會、國家的新型制度與信仰。因此，回顧臺人面對文明社會的進程，就不只是個人心理體認時代變遷的認同過程，也是直接參與社會實踐的過程，所以日治時代臺灣人文明化的經驗，是一個主動與被動交織的過程，一種無可奈何被迫接受卻又充滿試探樂趣的驚奇冒險。我們忍不住要問，當時的臺灣人是怎樣看待這個文明新世界？他們如何學習文明，以及反省文明？歡愉抑或傷悲？文明與臺灣本土文化關係如何？是否會導致對臺灣傳統文化認識的扭曲？

首先，我們要追究臺灣「文明」的來源。從上述諸位文人的體會與描述可知，在其人想像中，「文明」的內涵相似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而事實上揆諸時人的觀念，也會

明白「現代化」與「文明化」幾乎是可以替代的同義詞。那麼，文明／現代化究竟從何而來？前所提及的〈文明說〉徵文中，郭涵光認為「偉哉始祖軒轅氏修文明制度，創文明之武器，建設我五千餘年之文明大國。……論歐美科學制度之文明，其大致亦不出我範圍，然則亞細亞之大陸，實為文明發源之地，輾轉流播，以至歐美。稽諸東西歷史，不少蛛絲馬跡，可供探討……」。²他以為歐美國文明也源自於東方，只是後來大盛；而陳舉儒〈文明說〉首段便謂：「處廿紀之潮流，受歐風美雨之澎湃，野蠻之族，漸知開化，開化之國，日進文明。」，開門見山地斷言世界文明的啟蒙乃由歐美西方各國而來。就此，連橫在〈東西科學考證〉中，則有另一種分殊，他認為：「夫世界有兩大文明：一曰東洋文明，一曰西洋文明。……唯我臺灣當此新舊遞嬗之時，東西文明匯合若一……」⁴強調文明來源有二，東洋也有其自身的「文明」，而臺灣則是二種文明匯聚。綜合各人意見，已然可知時人對於「文明」源流的認識論（epistemology）並不一致，恰恰呈現了此一流行時代話語觀念的複雜性。

在目前研究中，從歐洲中心論來談臺灣的現代／文明問題，已經累積可觀成果，尤其深刻指出臺灣的現代化並非從本地社會內部孕育出來的，乃是日本殖民體制建立過程中的強行轉嫁移植。對於日本的引入現代文明，陳芳明一針見血的道出：「日本所理解的現代性是為了更為有效開發島上的資源，以利其資本主義的再擴張。」，游勝冠也洞穿殖民者所帶來的是看似進步的假象，故以「殖民進步主義」一詞去揭露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意識型態根本植基於優越與低劣二元文化的對立關係上，指出殖民真正目的在於支配與剝削，致使臺灣人成為「從屬的主體」，⁶終究無

法享有文明進步所帶來的幸福果實。另一方面，有關臺灣人容受文明的態度，相關研究早已指出眾所公認的賴和、楊逵、呂赫若等作家，有著清晰的抵抗意志，能夠辨識殖民文明的陰翳；而如呂正惠則以周金波、王昶雄、龍瑛宗作品為例，剖析其人在面對「現代性」(modernity)與「本土性」(nativity)時的曖昧與模稜，或立場的不夠明確，⁷相當程度反映出二十世紀臺灣知識分子對於文明究竟代表啟蒙、進步，或蒙蔽、傷害，有所苦惱與焦慮，甚至出現將現代性等同於日本性的認同危機。從追求到抗拒，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研究，目前對於當時新文學作家的現代性態度與思維，已有深刻闡發。

其次，在論及新文學家的現代性思維時，所必然涉及的與本土性間的扞格與融攝問題，也是研究者關注焦點所在。⁸從賴和以降的若干作家，其筆下的本土性書寫，多少觸碰了傳統儒家教化與民間庶民文化的再評價工作。在這之中，如張文環〈論語與雞〉，是對傳承儒家經典的私塾老師大加揶揄，也對部落的現代法律效力有所質疑，同時對斬雞頭的民俗有所嘲弄；從傳統到現代，什麼是衡諸四海皆準的科學與理性？張氏的辯證態度於焉浮現；而賴和〈蛇先生〉、呂赫若〈玉蘭花〉及〈清秋〉等文，則是透過蛇先生、小祖母、祖父行徑的描摹，在這些人物身上展示某些臺灣本土的質素進以抵抗日本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換句話說，新文學作家對於現代性／殖民性與本土性，實際存有敏銳批判與接受的辯證思維。

正因如此，「現代」與「傳統」有了激烈交鋒的時刻。為了全面迎向現代，日治時代的臺灣新文學家在求快速建構、確立現代性時，曾經在眾多作品中大力批判以傳統儒家文化傳人自居的

舊知識分子；⁹而在真實社會裡，傳統文人往往推崇東方文明，又與新文學家偏重於西方文明的立場相左，因此屢見對立。然而，我們同時又看到新文學家在探討現代性與本土性的關係面向上，重新體認了傳統文化的新價值，而有了如呂赫若〈清秋〉中，耀源極為景仰古典文人出身的祖父的情節敘事。這是在「現代」中再次省思「傳統」文人地位及儒道價值的結果，說明了新文學家對於傳統文人的評斷出現歷時性的變化，小說的刻畫投射了新文學家的文化心理樣態。

那麼，應當如何周全地評價日治時代的臺灣傳統文人及其表現呢？如何檢證傳統文人在新文明來臨時的「時代反應」呢？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文化抗爭〉並置思考了新、舊文人的文明知識論，他從後殖民理論出發，舉出若干傳統文人常將自我封閉於傳統文化之中，不去質疑殖民統治的合法問題；且認為傳統文人的力主東方文明更易為殖民者「執轡前驅」，或在日本提攜下成為強食者，並將漢學與日本國粹一同放在文明位階進以樹立漢學的文化霸權；他認為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在傳統的保護囊中「鈣化」，而在「對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再生產中，瓦解漢文化作為差異性的去殖民力量」。¹⁰倘若相較於游氏對當時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抗爭貢獻的肯定，傳統文人及其作品的反殖能力的確不夠強烈，而部分文人也有親日行為，游氏見解有其可觀、公允之處。只是據此便質疑傳統文人的整體解殖效能，則難免低估了若干遺民文人民族氣節的可能薰陶與影響，文學作品反抗意象的精神召喚，¹¹也無感於傳統文人的現實／現時焦慮，以及其人因應時代所曾進行的「創造性轉化」面向，這包括文化思維與文學典律的新變反應。

回溯日治時代，若干傳統文人呼籲鞏固東方文明的思考模式，其實是因應西方文明來襲而

生，具有抵抗的觀念，這與十九世紀末年，世界從「一元性的歷史」轉變為「多元性的歷史」有關。過去的一元歷史觀是受到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以「西方」為世界中央的史觀所影響，但其後非西方世界也開始發展獨立的自我。¹²不過，獨立的自我是什麼？日本的「脫亞入歐論」，以及肯定自我的近代化成果，研究者已指出這實際也是將自己置於西歐立場的觀點；¹³而日治時代的臺灣，作為新文化運動下一環的新文學，其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不管源頭是由西方而來或日本所引進，終究在這個學習現代文明的進程裡，扮演的仍然是一個弱勢追隨者的角色。那麼，回歸到東方文明的傳統，或形塑新面目的「現代」東方文明，是否有助於確立自我的主體意識？而在今日重新挖掘當時被視為守舊者的傳統社群，其維護傳統的決心與行為，能否證成其中辯證與防衛的積極性意義？

以連橫為例，當臺灣捲入波濤洶湧的西潮中時，其曾透過演講或書寫，公開發表若干捍衛傳統文化的言論，展現若干輿論效能。他以〈印版考〉、〈自來水考〉、〈留聲器考〉……諸文，去探討東方／中國也有科學文明的存在，並且更早於西方即有，¹⁴藉此力挽東方文明日漸衰頹的危機，鞏固東方文明的地位，就某一程度而言，是在抗拒西方霸權、穩定東方文明的主體性；同時他也著力於重述東洋學說的時代新義，進以與西方文明相溝通，尋找對立中的和諧；而其〈思想解放論〉、〈思想自由論〉、〈思想創造論〉、〈思想統一論〉……等文，更顯現其欲同時接納包容東、西方文明，達到思想解放自由的用心。¹⁵綜觀連橫的文明論，可以瞭解其所關注者乃文明的「現時性／現實性」意義，此「文明」非過往文化遺產，而是具有與時俱變的能動性，所以連

橫要在現代社會中肯定舊有文明的「現代」價值，其不以為與西方文明相較後的東方文明是一舊物，相反地依然是一亙古如新的「文明」。而對於此等給予舊有傳統文明賦予新義的作法，陳昭瑛以王松、洪棄生、連橫等人為例，說明儒家詩學在被異族殖民同化，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刺激下，獲致了「現代轉化」的機緣，而此轉化不僅提升傳統儒家詩學的新義，尤其在新舊文學的論辯責難中，還促成「儒家詩學和西方詩學的對話」，其結果更使「二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意外地發現儒家詩學對新文學運動的推展非但不是阻力，甚至還是助力」。¹⁶以上，透過昔人的言論或今人的研究，都說明了傳統知識分子面對「現代」時執著傳統文化的行徑，彷彿保守，但其實有著時代考量與肆應演變、衍異的作法，值得進一步考索。

為了詳實剖述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時代精神狀態，以及掌握其人的文化自律性怎樣穩固、轉化、改造，本書將側重考察傳統社群在現代性召喚下的文化視域。另外，其人在文學面向上的現代實踐，也是筆者亟欲探究的課題。近年來相關研究者已經深入闡述新文學作品中批判、檢討日本帝國主義引進的殖民現代化，本土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抗衡過程，摩登都會生活的描述與再現；且進一步考釋了域外新興社會主義思潮、新感覺派、超現實主義對臺灣作家及其作品的影響軌跡……¹⁷以上種種，顯示「現代」在新文學家的作品中有著清楚的時代風潮印記。那麼，在新舊文學論戰中被張我軍等人炮轟為「落後而守舊」的傳統文人，又將如何與新時代進行對話？相較於若干臺灣文學研究論述仍然沿襲張我軍於新舊文學論戰時的說法，¹⁸而對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給予「不合現代」的負面評價時，陳昭瑛〈啟蒙、解放與傳統——論二〇年代臺灣知

識分子的文化省思》一文，曾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提出若干提倡啟蒙與解放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於傳統其實有過反省、批判、重新吸收、重新改造的現象，並認為「比起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西化派或左翼運動家，臺灣知識分子表現出對待傳統與現代之更為圓融的智慧」。¹⁹陳氏的觀察與分析，對於調和臺灣新、舊文化／文學的對立論頗有助益。有別於其人從知識分子的現代面向中尋找傳統如何受到批評、再思與重視的研究取徑，筆者考量到「現代情境」其實是世界性的文化政治潮流，全球之人難免受其影響，因此採由挖掘傳統文人某些被遮蔽、壓抑的「現代性」入手。²⁰是故，在本書各篇章中，將致力於考察傳統文人在新世界洗禮後的文化思維與審美趨向，瞭解「現代」特質如何被轉化成作品實踐？當然，這樣的關心趨向，是植基於反省現階段有關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學／文人／文化研究的若干盲點，並非全盤否定傳統文人實際仍存的「傳統」特質，也就是說本書的研究是藉由特定問題意識而產生的。

而伴隨著筆者所欲論述的傳統文人的維新表現，相繼而來則衍生出另一有待釐清的問題，即何謂「傳統文人」？因為接受新學而具有文明氣息，但卻以傳統文學寫作為樂的人，是所謂的「傳統文人」？或者該歸於「新」文人行列？對此，於本書中所出現的「傳統文人」、「古典文人」，或「舊文人」，係用以指稱其畢生文學創作主要表現在傳統文學（文言文、漢詩、文言小說……）寫作上的文人而言。這些人的文學成績，儘管可能不乏維新思想的言論而與新文學家近似，如連橫、魏清德、謝雪漁、鄭坤五……等，但在目前仍以其舊文學的成果而作為其一生評斷所繫，故在臺灣文學史中依然被視為傳統文人群；相對地，某些文人雖然一生中曾經寫過傳統文

學作品，如張我軍、賴和、林荊南……等，但是由於其人對於新文學（白話文、新詩、白話小說）的強力支持與創作實踐，甚至在新、舊文學論戰中站在支持新文學的一方，對於傳統文學多所批判，因此仍被視為代表新文學家一方。也就是說，在檢討反思現階段臺灣文學研究時，採用目前的慣用分類始能顯現本書的研究效能，故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不過，透過本書的探索，筆者實際更欲凸顯現階段以傳統文人與新文學家區隔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模式，其實可能忽略二者間的某些共通的現代性經驗，嘗試以二十世紀臺灣文學的論述視界出發，當是未來所可努力的方向。

二、

為求廓清歷史迷霧，本書在〈序論〉之後，分由七篇文字針對前列問題加以闡釋，嘗試勾勒傳統文人與新文學社群間的競爭、協力，與殖民帝國文化霸權的抗爭、共構，以及和中國、日本、西方世界的文學現代性交流、溝通、對話的種種樣態，進以說明傳統文人在此多元而重層的刺激影響下，接受、抗拒或依違於二者之間，所形塑出的複雜糾葛的肆應「鏡像」，²¹盼能重新認識其人的思想特質與時代定位。而在論述時，有關「現代性」內容的探討，將在政治、經濟層面外，更加留心社會、文化文明，並凸顯多元與另類的現象，藉此說明本島現代性的來源及出路並非唯一，而是複數；同時也指出「現代性」之於臺灣或臺灣文學，其顯現與生成，不能化約為單